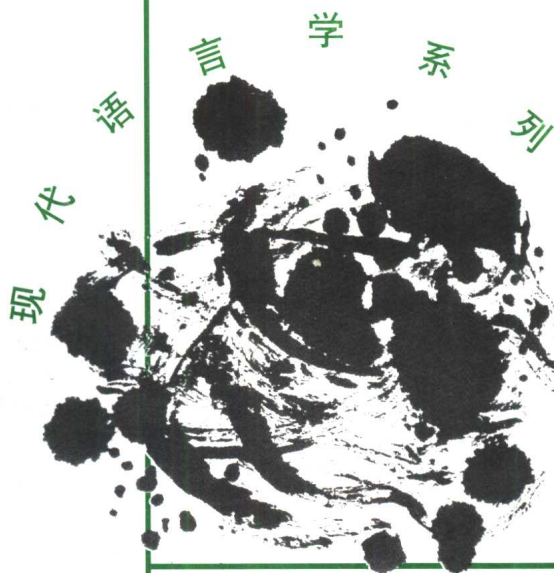


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

申小龙 著



现代语言学系列 6 许威汉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现代语言学系列之六 许威汉 主编

语言与 文化的 现代思考

申小龙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申小龙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1

(现代语言学系列/许威汉主编)

ISBN 7-215-04057-7

I. 语… II. 申… III. 语言-关系-文化-研究 IV.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8384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偃师市海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375 字数 186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册

定价:14.00 元

《现代语言学系列》序

语言学是基础科学,又是领先科学。语言学的新发展,是时代的要求。

从历史上看,19世纪开始,就有三种因素对语言学的发展起作用:一是科学上的重要发现、发明以及各种学说、社会思潮对语言学产生影响;二是社会的需求推动语言学演进;三是语言学自身要求解决一系列内在问题。而三者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20世纪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应用范围大大超出单纯的数值运算;它与语言学结合,使语言学发生巨大变化,并相互作用,即计算机给语言学发展以影响,语言学对计算机的发展起作用。未来社会是信息社会,人机对话更将不断扩大语言交际职能。语言学的功用自必更为突出,语言学的发展自必更为未来社会所关注。

传统语言学的基础雄厚与否。对解决当前问题和迎接未来任务也举足轻重。随着近年文化和文化史研究热潮的掀起,出现了语言与文化相关性的理论,主张科学的语言学应向民族文化和民族语文传统认同并加以转化,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语言学正面临时代召唤。

任何学术不是从零开始的,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的统一。语言学没有例外,必将循途继轨,不断有所发明发现。况且作为一种学说,向来都有补正发展余地,语言学说借鉴外来新知,发扬优良传统,达到后出转精,正是学科发展所使然。

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研习语言热情日益高涨,为适应新形势,“现代语言学系列”的撰写是十分必要的。本系列书起点高,眼界宽,内容丰富而系统,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实用性、指导性和资料性特色,适用面广,语言文字工作者、语言文字爱好者,以及其他各有关学科研究者,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通读是书,当可深会而知之。

许威汉 写于上海师大

序

许威汉

吕叔湘 1935 年译路威(R·H·Lowie)1929 年著的《文明与野蛮》一书 80 年代重新出版,有利于当代读者增进知识,开阔眼界。路威原著叙述了衣、食、住、交通、工艺、婚姻、家庭、民族、国家、礼仪、教育、艺术、宗教、医药、科学等许多方面的内容,从物质到精神的人类社会生活都谈到。吕叔湘译本还在有些地方加注中国资料,益有利于国内读者理解原著。《文明与野蛮》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以全人类作为研究对象而力求了解人类自己的人类学撰述,是人类文化史和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的专著。不妨说是 19 世纪美国进步科学家路·亨·摩尔根(L·H·Morgan)的人类学在 20 世纪的发展。

19 世纪,达尔文从生物学方面研究人类,开始了人类学的研究;摩尔根依据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写出了《古代社会》一书,创立了社会人类学(亦称文化人类学)。恩格斯采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料,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名著,指出“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所提出的

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7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出版)。

在西方文化学思潮影响下,梁启超 20 年代后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提出撰写文化专史的主张,并拟就了《中国文化史目录》(惜未成书)。后来郭沫若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闻一多研究《诗经》和《楚辞》。也多少渗透着文化人类学意识。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辨》则体现了文化人类学的应用。至于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柳诒征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王云五的《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缪风林的《中国民族之文化》、陈安仁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韦政通的《中国文化概论》等著述,以及有关中国文化研究的不少专题论文,自然也不能排除文化人类学意识的影响。这也就是说,近代的西学东渐和“五四”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相当程度上对中国文化和文化史的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当然,我国对文化、文化史的注意,早在唐宋就开始了。宋代郑樵在他的《通志》中开列了二十略,自上古至唐,就有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仇、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些。其中除袭用唐代杜佑《通典》旧文外,氏族、文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为旧史所无,报具创见。事实表明,早在唐宋,已经注意到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开了文化史研究的先河。从这一事实上看,12世纪郑樵的《通志·二十略》(暂不说杜佑的《通典》)和19世纪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它们对人们认识古代文化的启迪,体现了中外文化意识的交织,也体现了古今学术思想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运用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变化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始于20世纪初期。美国的萨丕尔(E·Sapir)和沃尔夫(B·L·Whorf)就已经这样做了。当前则趋向于通过对亲属关系、植物分类、颜色谱系等的分析,来揭示语言的语义系统与人类文化背景的联系。这种研究,人们称之为语言人类学或人类语言学(萨丕尔和沃尔夫也被称为早期的人类语言学家)。人类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便是人类文化语言学(或民族学派语言学),它研究语言和文化行为间的相互联系,其中包括语言决定文化还是文化决定语言,语言对理解力和思维有何联系,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有何关系等等。最早提出这方面的研究的是德国人类学家洪堡特(W·Humboldt)。随着现代社会科学中出现文化学或文化科学(又称文化哲学)的新学科,同西方人类文化语言学大致相当的学科文化语言学也应运而生了。作为中国文化语言学,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学与文化学的关系、重视语言的人文属性、强调从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特征揭示汉语特点。文化体系不仅是一种形态(物质形态和意识形态)。而且是一套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具有外显的构架和隐形的构架,从根本上制约和指导人的思想行为。语言是特殊社会现象,由文

化系统的所支配。从文化心态特征揭示汉语特点和规律,是符合逻辑的。英国汤恩比《历史研究》一书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作为考察点。确立起一种新的史学类型——文化历史学;借鉴同样的原理原则确立起一种新的语言学类型——中国文化语言学,也不应该是不能接受的。

回顾我国语言学科发展的历程,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学与文化学的关系,事实上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初见端倪了。比如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从整个文化发展角度,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阐明音韵学的演进;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从语词的涵义探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等,就是先例。遗憾的是,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文化和文化史研究沉寂了 30 多年,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语言学与文化学关系的研究也随之没人问津。直到 80 年代才热闹起来。80 年代初期,先由文化史的讨论引出文化定义之争,定义之争又引发了文化研究的众多问题的讨论,引起了我国理论学术界较普遍的关注。其所以引起我国理论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主要是因为受当前现实的感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制订,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热潮涌向全国,在经济、政治以及日常生活诸领域都对固有思想观念产生极大影响。许多新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促使理论学术界面向现实,反思过去,重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总探讨,同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也随之提到新的日程上来。文化语言学作为一门新生学科,也就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了。与此相照应,全国

语言与文化学术研究会,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讨会等也相继召开了。这不是先时人类文化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涵义上的历史重复,更不是早期人文学涵义上(语言学的一大起源是对古典作品的考据,所以早期人们把语言学当作人文学)的历史重复,而是中国语言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个重大发展。

当前,国内学者有的从汉族人的文化心理特征揭示汉语的特点,有的则以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为媒介去探求中国文化的特征。诸如此类,集中到一处,便是强调语言的人文属性。申小龙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一书,正是他继自己先后出版的《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中国句型文化》等许多部专著之后问世的强调语言人文属性的著作。张世禄高度评价该书说:“本书的研究中对人文主义语言观的科学阐释,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文化反思,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核心——汉语人文性的论述。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文化功能的探讨,都发前人所未发,卓有建树。尤其是本书最后部分对中国文化语言学方法论的详瞻的阐述,更是独辟蹊径。一空依傍,显示出文化语言学在方法论上扎实的探索,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申小龙所总结的八种文化语言学方法,本质上也是当代人文科学研究所应遵循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文化语言学·序》)

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的见解在许多中青年语言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纷纷发表文章,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意义及其科学体系表示赞赏。他们的意见可归纳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语言学由描写型走向人文型的历史性转

折,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创立体现了中国语言学年轻一代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兴起适应了我国语言学要求变革的思潮,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学从此开始了描写和解释并重的新时期,中国文化语言学为中国新文化建设拓宽了新视野。他们还说我国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的,西方语言有严格的形态,从拼音字母的性质到时、数、性、态,都适合进行精确的描写分析;而汉语倾向于“艺术性”,像词类的灵活性,句法结构的伸缩性,汉字的形象性,都具有强烈的人文特征,因此,文化语言学更符合汉语实际这一结论是可以进行充分论证而使之成立的,今后必须更好重视汉语人文性以探索汉语语言类型特征。不难看出,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撰述有其自身内力,也有其客观基因。诚如申小龙本人所说:“几年来,我从汉语语法问题入手。对汉语与汉民族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在联系作了多侧面的考察,其间还吸收了国外语言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中青年同行有关研究的成果和国外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成果,逐步形成了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系统的认识”。(《中国文化语言学·后记》)

借鉴现代语言学的成就,对汉语和汉民族思维形式,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在联系进行考察,益以新知,形成自己见解,自是义不容辞。同时,老一辈语言学家没有走完的路,年轻一代的学者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继续前进而有所作为,更在情理之中。事实正有如陆丙甫与申小龙争鸣的文章(1990年第一期《汉字文化》)说到的:“友人申小龙。数年来悉心研究汉

语语言学,成果丰硕,令人瞩目。他对郭绍虞、陈望道、张世禄诸位前辈学者强调汉语独特性的学术思想作了全面的、更深刻的发挥。可以说是上述三位前辈语言学术思想在年轻一代语言学者中最集中的代表和最出色的继承。”(转引自香港《语文建设通讯》33期63页。按说申小龙观点是陈望道学术思想的继承固然有嫌牵强,但说与郭绍虞见解有渊源关系还是说得过去的。)现在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等书相继出版,不断有所发明发现,显示中国语言学从本体论到方法论都获得充分的当代意义,实是值得庆幸的。

科学的发展是人类客观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突出地表现在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理论大综合上。没有例外,语言科学的发展自然也是顺应这一历史路线的。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新阐释,必将在中国语言学理论大综合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面对现实,回顾历史,确是使人鼓舞。因为我国古代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理论,《荀子·正名》阐述哲学见解而涉及语言理论,固然精辟,可是后世没有嗣响;汉代《释名》作者刘熙想建构语言理论框架,可是方法论错了,愿望不能实现。没有语言理论,历史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也就没能产生,直至近世借助西方语言学便难免缺乏敏锐的鉴别能力。在新老语言学者共同努力下,我国语言学各个领域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但未臻完善,有待继续开拓。近年出现语言与文化相关性理论,主张科学的语言学应向民族文化和民族语文传统认同并加以转化,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从民族语言探求民族特点,又从民族特点来探求民族语言特点)这作

为一种学说提供学术界讨论,当是无可厚非。因为任何一种学说,向来都有补正。发展余地,语言学理论也该如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问世,显然是件大好事。至于它的学术价值如何,经过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自有公论。

无可讳言,有了第一本的《中国文化语言学》,还会有第二、第三本问世,也可能会有意见不同乃至相反的成批撰述出版,果真这样的话,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确实起到引发讨论的积极作用。通过讨论,必然有利于把问题引向深入,进一步有所发现。在这里。我们重温恩格斯的一段话,倍觉意味深长,恩格斯这样说道: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也给我们每一个科学工作者提示了努力进取的方向。如何使在语言学领域“有独到的发现”,而“不是肤浅地研究”。正有赖于长期的埋头工作。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而且要有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样为同一目标而奋进的共事者与继事者。申小龙本人曾深有所感地说:“35

年前尚有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一书。他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追溯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试图在语言学和人类学之间搭起一个桥梁来。这样可贵的努力终于后继乏人……”(《中国文化语言学》103页)事实确是如此。平心而论,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够艰巨复杂的,要有大量的后起之秀肩负起历史重任。“在各种系统中再没有比人文系统更难于深入理解的复杂系统。因为这些系统的性能是由人的判断来决定的。按照通常的惯例,这种问题只能通过各抒己见的方式来阐述,而不是用数学严格的方式来陈述。但是,可以预料人文系统研究的未来进展肯定决定于适当的公式化。”(C·V·尼古塔、D·A·拉莱斯库《模糊集在系统分析中的应用》。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汉语研究要从汉语实际出发。但真正面向汉语实际以寻其规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比方说,上古否定副词全都是唇音字,常见虚词集中在“鱼、之、歌、寒”各部。其内在因素究竟是什么,又如何从中国文化大系统中获得解释,并力求从“各抒己见”到“公式化”(有必要“公式化”的话),就很不简单。诸如此类,将有赖于集体智慧的发挥。

今兹喜读申小龙又一专著《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欣闻广大青年语言工作者要求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呼声,感触良多,特书所怀,以与广大青年语言工作者共勉,努力从语言事实的实际调查入手,探源析流。切实有效地做好眼前工作。

深入揭示汉语规律并明其所以。季羨林指出,“申小龙先生意见很有启发”,“中国思维方式是倾向于综合,而不是分析”,“民族典型的思维方式……必将表现在各个方面”(《语文建设通讯》34期),循是而求,中国语言学将展现新的前景。

上海师范大学许威汉

前 言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当代人文科学研究共同关注的一个课题。本世纪初,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西方语言学也在其人类学的实践中发展出语言与文化相关性假说。60年代兴起的社会语言学,在许多问题上涉及语言的社会文化本体论。进入80年代,中国语言学工作者对汉语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描写主义倾向作了深刻的反思,对汉语的文化性征作了积极的探讨,中国文化语言学蔚为大观。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文化语言学论著的出版和语言与文化会议的召开,许多理论问题正引起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和研讨。本书试图将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在理论上做出新的阐述。这些问题我在全国首届和二届语言与文化研讨会、社会语言学讨论会的大会报告中都做过论述,并在日本一些高校和日本中国语学会作过演讲。本书则将这些报告内容在理论上系统化,总题目为“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文化大系统内一个子系统。然而这个子系统又有其特殊性,即它在结构上清晰地表达出文化上的定点,它提供了决定说话者概

念世界的分类系统，一句话，它是该文化系统的一种典型形式，它对整体的文化系统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包容文化的一切，涵盖文化的一切。

语言对文化的这种涵盖力，首先是国为语言与人类的社会行为融为一体。正如现代功能人类学所指出的，语言不仅仅是与人的物质设备及其他风俗体系分离的机能；语言的意义也不仅仅是语词所具有的可以在发音中传给他人的神秘内容。在实际应用中的语言的意义并不是神秘地包涵在一字的本身之内的，而是包涵在一种情境的局面中(Context of situation)，由发音所引起的效果。发音作为一种动作，是人类协会动作方式中所不能少的部分。它是一种行为的方式，和使用工具、挥舞武器、举行仪式、订定契约完全一样。“事实上，字词的应用是和人类一切动作相关连而为一一切身体上的行为所不能缺少的配合物。一字的意义就是它在协合动作中所获得的成就。它的意义时常就是人由直接地对付他人的动作而得到间接地运用环境的效果。”^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功能人类学认定说话是一种人体的习惯，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和其他风俗的方式在性质上是相同的。正由于语言是和人类一切动作相关连而为一一切身体上的行为所不能缺少的配合物，所以它渗透于文化的各个领域，具有任何符号系统无可替代的文化涵盖力。

语言对文化的包容一切的涵盖力，又是因为语言既是文

① B. Malinowski, What Is Culture, George Routledge.